

# 特立独行的羊如何找到方向 ——读加藤周一《羊之歌》

邹波

加藤周一曾经在评述日本文学时精辟地指出“文学即思想”。《羊之歌》作为一部随笔作品，雅致的文字不仅体现出作者的教养学识，也凝聚了他对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思考结晶。用“文学即思想”来形容这部作品，算得上恰如其分。

## 个人与时代的历史记忆

2019年，正值日本战后学者、评论家加藤周一百年诞辰。北京出版社适时推出了加藤周一的随笔集《羊之歌》（翁家慧译）。1919年为农历乙未年，加藤自述道：“以‘羊之歌’为题，一方面是因为我出生于羊年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跟羊的温驯性格有不少相通之处。”

《羊之歌》是加藤周一的自传性随笔，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连载于《朝日期刊》。前篇从幼年记述到1945年日本战败，续篇则以战后为中心，讲述到1960年日美缔结新安保条约。对于加藤而言，1945年与1960年两个时间点



加藤周一及其《羊之歌》

加藤周一著  
羊の歌  
——わが思想——



岩波新書  
F96

意义十分重大。“1945年秋，我朝着战后的日本社会出发。”“1960年是对战后我在东京的生活得出结论的一年，同时，也是朝着以后的生活启程出发的一年。”夏目漱石在《三四郎》中借美弥子之口提出“迷羊”的概念。或许《羊之歌》

便是一部“迷羊”的成长史，记录了一只离开了羊群，特立独行的羊，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前进方向。

加藤周一曾将福泽谕吉与河上肇的自传誉为日本自传文学的双璧，原因在于两者均将个人的发展史与时代的发展史

相重叠。《羊之歌》也是如此，它既是一部个人的小历史，又是一部跨越了大正、昭和两个时代、见微知著的大历史。

## 感受体验与思想的成长史

加藤周一曾经说过，“文即人，人即思想与感觉”。《羊之歌》的前篇从《外祖父的家》开始，到《八月十五日》结束，记叙了加藤自童年至青年时期个人的成长经历、个人独特感受体验的形成、知识的储备与积累，以及二战期间思想趋近成熟的过程。开篇的《外祖父的家》让人联想起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第一卷《在斯万家那边》中家庭生活的记忆。加藤的

外祖父年轻时曾游学意大利，精通外语，过着西式的生活，喜欢西洋美食与意大利歌剧。童年时受外祖父影响而感受到的味觉、听觉，在加藤幼年的心中建立起独特的感官体验，让他在若干年后旅欧时感觉到“西欧给我的第一印象，不是跋涉千里终于抵达的异域，而是悠长假期之后重新返回的故乡”。与外祖父家的“洋味儿”相映成趣的是，祖父家在农村，给加藤的童年记忆留下了“泥土的香味”，农村经常举办盛大的法事、婚礼，而加藤却感觉“在所有的宴会上，我认为自己永远是一个局外人”。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渐渐从一个被动的观察者，主动成为一个观察者。这样的视觉经验也影响到加藤成年之后以冷静的目光

（下转12版）➔

◀（上接10版）

不知的地志、碑拓。

理解于此，可以说夏婧所治虽以《全唐文》为对象，她的学术储备则追求完整把握所有与唐代文史有关之典籍，所有用书也尽可能地遵循征用善本之原则，进而讨论体例与编纂用书，讨论编纂阙失，无不征引丰沛，行文简偶，分寸恰当，讨论深入。限于篇幅，不能一一介绍，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讨论。

别集是唐文辑录的主要来源，但各家集传本之早晚完残差别很大，本书对此有具体分析。如张说集，明清主要流传的是缺末五卷的残本，《全唐文》亦未征及三十卷足本，但又比四库本《张燕公集》有很多增加。夏婧分析，《全唐文》比四库本别集增加33篇，其中14篇亦见于三十卷本，但仍有十多篇仅见于三十卷本者失收，很可能当时曾征及与三十卷本同源的文本。再如徐寅集，四库本《徐正字诗赋》仅存文8篇，《全唐文》收28篇，除2篇存疑外，所增18篇皆见于《宛委别藏》本《钓矶文集》，可知所补可信，但后者仍有21篇为《全唐文》失收，知未直接采录此集。类似

情况很多。《全唐文》由于广采文献，于各家别集以外均有增益，惜甄别稍疏。夏婧表列48种唐集在《全唐文》中有所增益的具体篇目，指出其中至少有48篇为误收、8篇疑误，这对今人整理唐集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地方文献与石刻文献利用之分析，尤能见到夏婧综括文献、辩证取舍的态度。她分析全书，认为所取最晚文本或为嘉庆十八年修成的《溧阳县志》，段迥《匡城县业修寺碑》可能源自嘉庆十四年成书的《长垣县志》，而明末始出的钱鏐《投龙文》，所据可能是乾隆《震泽县志》。她认为方志偶有依托文献，但各地修志层层递修，渊源有自，艺文、金石诸门尤多当地作品。石刻的保存往往具有地域性，清中期金石学兴起后，各地访碑颇多收获，许多今已不存，《全唐文》保存若干仅见的地方石刻。《全唐文》石刻搜罗虽广，辑校质量则颇为参差。所录有为最佳文本者，如郑仁表《孔纾墓志》，优于《金石萃编》与存世拓本。可惜多仅主一本，所选又未必为佳拓，不尽如人意者自多。

《全唐文》对《永乐大典》的利用，是另一特别值得注意的

分析。《大典》成于明初，凡22877卷，清代开四库馆时已缺约2000卷，今存仅820卷左右，不足原书的百分之四。修《全唐文》期间因曾调入《大典》，是学者最后一次大规模据以辑佚书。《全唐文》据《大典》录大宗文章而未注依据者，前人已经推测有李商隐文集与南唐陈致雍《曲台奏议》，总近三百篇。夏婧分析有几种情况，一是直接辑自《大典》者，可据今残本覆案录文；二是辑自四库馆《大典》辑佚书者。对《大典》本于唐文校勘之价值，也有所论列。

对《全唐文》的体例、编次、文本汇校、案语考异等分析，以及编纂阙失的讨论，也都很精彩，这里不作介绍。

夏婧本书涉及大量唐文之细节研究，对真相之追究，看似琐细，其实意义非常重大。仅举一例。若干年前，我与学者讨论《二十四诗品》是否晚出，曾相信刘永翔教授的意见（刘文《司空图〈诗品〉伪作补证》，刊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1999年1期），认为“水流花开”一句为据苏轼《十八大阿罗汉颂·第九尊者》“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”而写，旁证有南宋初许颢《许彦周

诗话》云此二句“还许人再道否”，另惠洪、韩淲均以此八字为韵写诗。李祚唐先生撰文《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之一例》（刊《文汇报》2005年11月2日《笔会》），认为《历代赋汇》卷一〇六收唐刘乾《招隐寺赋》有“空谷无人，水流花开”，《全唐文》卷九五四也收了，证明是苏轼抄袭了唐人。我撰文反驳，认为镇江府招隐寺创建于南宋景定元年（1260），刘乾应为宋以后人，却苦于无法确认刘之生平与此文流传轨迹。夏婧考定刘乾为明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进士，官至国子监丞，此赋见于刘乾别集《鸡土集》卷一，清编《历代赋汇》误作唐人收载而为《全唐文》沿袭，让这一讨论可以圆满结束，足还苏轼以清白。

夏婧确定本书选题到初稿、定稿的近十年间，我一直在做清人所编另一部大书《全唐诗》的清理与重编工作，已经接近完成，对夏婧所做工作的意义，更有许多彻骨切髓的体会。一代基本文献编纂，无论在何时，都是造福后人的学术积累工作，理应追求更高的学术目标。清代编的这两部大书，虽然大家都用，因不说明文本来源，只是广搜博揽地将当时

能抓到筐里的所有作品，放在一起汇成总编。《全唐诗》更甚，基本是明以前任一一种书中宣称是唐诗的作品都放在一起。今人已知问题多有，又不知如何解决。特别在今日，学术资源越来越全球共享的氛围中，要编纂出满足各种不同学术与文化需求的读者之要求，又能为学者充分信任的一代总集，真是难上加难。我做过《全唐文补编》，知道《全唐文》以外的唐人文章，前人辑未辑者大约还有两万篇左右，新编《全唐文》的学术难度及工作量，大约是重辑《全唐诗》的三至五倍，且要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，就不能寄望集体编纂，我对此视为畏途，不知今后有人能胜任否。

从本书中，我看到夏婧博士的冷静客观，看到她的审慎谨严，更看到她的从容成熟、理性大器。我很为她高兴，知道她还能做许多有学术意义的工作。年轻真好，可以有更长远宏大的计划铺展，可以有更多复杂的变化值得尝试、抱持期待，也送上祝福，当然更希望她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能力与才分向各方面自由地延展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）